

# 从铁笼囚禁到文化植入

## ——论《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的权力规训

戴春雷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 卡夫卡《致某科学院的报告》是一份受虐狂向施虐狂汇报受虐体验的报告,其背后隐藏着一座由技术官僚构成、假科学名义施暴的权力城堡。猿性而人名的报告者红彼得只是权力生产的结果,权力才是该小说隐身不现的主角。最高官僚权力机构科学院通过各级暴力运作对红彼得实施规训与操控,强迫其就范,诱惑其为奴;红彼得在报告中所炫耀的进步与成功,究其实质不过是它在权力狡计之下从受虐转变为自虐的身心自戕而已。官僚机构的权力规训由机械打击的硬暴力与文化植入的软暴力相配合完成,其规训效果则表现为红彼得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迎合与膜拜权力并自我驯化。

**[关键词]** 权力规训;暴力运作;自我驯化

**[中图分类号]** I 52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2024)02-0086-07

1917年是卡夫卡创作成熟时期(1912—1924)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卡夫卡完成了几篇他自己非常看重的作品,《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便是其中优秀的一篇。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红彼得本是非洲黄金海岸上一只自由自在的猿猴,它被人类用一系列暴力手段捕猎、运输、驯化、贩卖、收编,因其甘愿成为家奴社畜而进入人类社会,成为半人半兽、身份焦虑、精神分裂的异化存在。红彼得所自鸣得意的进步与成功其实不过是其逃避自由的借口、掩盖生命颓废的幌子,它妄图通过驯顺迎合的姿态换取其在暴力等级秩序中膜拜权力核心的奴隶位次的晋升。权力规训有一套凶残而狡猾的手段,从暴力制服到文化植入,直到猎物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自虐式地认同、膜拜权力。红彼得的报告生动再现了自由生命被权力规训直至自我驯化的颓废过程,卡夫卡以此隐喻了现代社会中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 一、长官集团：一座以科学进步为名义的权力城堡

卡夫卡在《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隐藏了

一座由技术官僚构成的、以权力作为逻各斯中心的城堡。从枪手、船员到教师、宴会主持者,再到各级科研人员,构成如微积分般繁复而没有尽头的权力阶梯,他们代表着一系列等级森严的暴力秩序单位。小说通篇都是红彼得事无巨细的自述,它竭诚尽忠的报告都是对权力要求的积极配合,而权力机构面对红彼得极力讨好的行为却一直保持高深莫测的沉默姿态。红彼得与卡夫卡《城堡》主人公K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的一切思考与行动都是以权力为逻各斯中心,而科学院与城堡则同为高耸入云的权力机构的象征,他们终生都在为寻求权力体系的认证与庇护而奋斗,却始终被排斥在权力城堡之外。

#### (一) 权力压榨与个体抉择：从普罗米修斯到红彼得

“尊贵的科学院的长官们”<sup>[1]362</sup>是该小说的开篇第一句,它直接奠定了整篇小说的叙事基调:红彼得在权力面前的卑微与迎合。从这句复数形式的称谓语便可以看出小说中存在着一个高高在上的、以科学为名义的官僚权力集团,统称他们为“长官们”,红彼得很熟悉这套系统并非常敬畏他们,他们虽然没有在文本中正面现身,

**[收稿日期]** 2023-08-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WW016)

**[作者简介]** 戴春雷(1979—),男,吉林双辽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

但其暴虐的权力阴影却时刻通过其下属暴力单位笼罩整部小说。虽然最高权力的面目一直隐而不显，但读者始终能清晰地感受到有一双居高临下的权力之眼在傲慢地审视着红彼得，这使红彼得焦虑不堪、无所适从。红彼得在报告中呈现出来的屈服顺从、逃避自由、身份焦虑、谋求成功等生命颓废状态，恰恰都是长官权力集团持续施暴的结果。红彼得的际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其主题同样是个体生命面对横暴权力的摧残。两位作者对暴君宙斯与科学院在文本中位置与作用的处理可谓异曲同工——权力虽不正面出场，却无处不在；普罗米修斯与红彼得面对权力压迫的反应却截然相反、判若云泥，而他们的抉择与行动所引发的后果之于其族群也必然是天渊之别。马克思赞颂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史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而卡夫卡通过红彼得大声疾呼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不，我可不要自由，要的只是一条出路，左边或是右边，去哪里都成。我没有其他要求，哪怕这出路只是一种假象……往前走，往前走！只要再不必高举双臂，紧贴笼壁，寸步难移”<sup>[1]365</sup>！可见，红彼得完全丧失了普罗米修斯崇高的追求、顽强的意志与无畏的勇气。红彼得这种为了苟延残喘而无可为的态度，不但使其自身沦为奴隶，而且更使其族群有被人类批量驯化、代代走上奴役之路的风险。自由需要付出代价，但那只是一部分成员的代价，而被奴役却是族群代代相传的代价，因此，“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sup>[2]150</sup>。

## （二）科学进步作为权力的新宿主

小说中科学进步被赋魅，成为权力的新一代宿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卡夫卡对启蒙主义的反思。红彼得对科学院表现得极为驯服，它以背离猿猴本性、模仿人类生存方式为荣，甘愿成为人类的影子，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并非是崇尚科学、解放生命，而是认同暴力等级秩序。科学院本来是代表人类思想文化进步、认知能力提高、旨在服务与解放人类的科研机构，但在这篇小说里它却成了一个高高在上操控、奴役个体命运的权力机构，长官们则是以科学名义掌控这一驯化机构的权力集团。古往今来，权力总是要依托在

一种人们信仰的东西上才能发挥作用，比如，古希腊的国王和英雄都是半神人，当权者通过神话思维导出神圣血统论，进而推出“君权神授”的信条。人类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神学统治渐趋式微，科学思维渐渐取代神话思维。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便被奉为指引人类未来方向的金科玉律，因而被赋予至高的价值与权力。于是科学便被统治者利用，成为权力的新宿主，尤其是“唯理性主义”通过媒介宣传成为控制人们思想的统治力量。卡夫卡《致某科学院的报告》恰是对此时代风尚的反思与批判。红彼得就是一个被“唯理性主义”和所谓的科学进步异化了的自由生命。近年来，学界就科技进步与人文理性间的冲突进行深刻反思，这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红彼得的遭遇向我们证实，并非所有的科学与进步都是有益于人类的发展，有的甚至有巨大的破坏性，可能把人们带向奴役甚至毁灭之路。尼采曾敏锐地指出，启蒙、进步与权力统治间的微妙关系，尤其是它们对个体生命意志的负面影响，“思想启蒙运动……使人变得更无主见、更无意志、更需要成帮结伙……在‘进步’的幌子下，会使人变得更卑贱，使人变得更顺从统治”<sup>[3]37</sup>！汉娜·阿伦特则更直接地警告：

在我们这个迷信的时代，进步观念是一个更加严肃也更加复杂的课题。……自现代以来，自然科学实际上已经成了“普遍”科学……科学进步不再和人类的进步步调一致，而且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终结，正如学术的进步发展可能最终毁灭所有使得学术仍有价值的东西。换句话说，进步观念不能再用作标准，以此评估我们已经无法掌控的灾难性的飞速发展进程<sup>[4]98-99</sup>。

汉娜·阿伦特担心科学极有可能沦为一种异化人类的暴力，而且是一种带着真理面具的、极具压抑性与毁灭性的暴力。哈耶克说：“那些陶醉于知识增长的人往往成为自由的敌人。”<sup>[5]49</sup>而卡夫卡在《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的科学院本质上就是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权力，异化为自由的敌人。它的下属官僚包括：船商老板、公司总裁、教师们、各级船员、捕猎队枪手们等。这些人都是通过掌握科学与技术而获得位置和利益的

各级官僚,他们分工协作一起开动各种暴力机器。这精密的权力组织机构就像一个食欲旺盛的消化道<sup>[6]</sup>,不断地寻找着可吞噬的猎物——格里高尔们、红彼得们、K们。

## 二、权力规训的手段:从器械暴力到文化暴力

权力规训的目的是为实现对生命的全权操控,以便榨取价值。规训往往在2个层面依次展开:以暴力制服肉体、以文化奴役精神。暴力打击把恐惧与无助注入生命,以实现个体的无法自主;文化灌输则是在生命中植入奴化意识,以实现奴隶的自我驯化。长官集团深谙权力运作之道,并拥有一套分工精细、合作完美、行之有效的驯化流程:从钢枪、铁笼到教室、会场与办公室,从暴力制服、囚禁到文化渗透、收编,权力首先对自由生命意志进行打击瓦解、化整为零,再以等级秩序的文化意识形态对破碎的个体生命进行浇铸、重塑,于是一个唯权力马首是瞻的提线木偶就制作完成了。哈耶克认为,“权力和强制是紧密地相伴而存在的……用暴力行为相威胁是强制的重要表现形式”<sup>[5]193</sup>。

### (一) 器械硬暴力:枪与笼

权力对红彼得驯化的早期阶段主要是以器械打击摧毁其自由意志。这只猿猴的“人生之旅”起始于硬暴力的孕育,在钢枪的阉割与铁笼的囚禁里诞生了红彼得病态的生命形式。红彼得说:“枪响了……我中弹后醒来,发现自己已……被关在一个笼子中。”<sup>[1]363</sup>这里暴力明显具有一种强大的生产能力,钢枪与铁笼使这只猿猴“重生”为红彼得:钢枪让它被锁定、被选中,铁笼成为它第二次被孕育的“人造子宫”,船员们的丑态演示与恶习灌输是使它发育的供血脐带,走出铁笼即分娩的象征,主人赐名“红彼得”是它的受洗仪式,当然也是另一种暴力接管的开始,总之,从枪疤到赐名都是其双重阉割后列入奴籍的烙印。

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中说,“暴力本质上工具性的”<sup>[4]112</sup>,它充当权力的打手与急先锋,打击并限制个人的自由,为达成权力对生命的支配与操控奠定基础,同时,暴力本身也必

须借助于工具和技术来达成使对象屈服的强制效果,因此,“暴力……它依赖的是工具”<sup>[4]105</sup>。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宙斯派出的第一暴力梯队由1个工匠技艺之神赫淮斯托斯再加上2个粗鲁的打手暴力与强力构成,2个凭暴力负责抓捕,1个以技术锁缚,分工协作以剥夺普罗米修斯的自由。这种暴力组合模式在《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被戏仿为钢枪猎获与铁笼囚禁的暴力技术手段。红彼得毕竟不具备普罗米修斯的神性,更缺乏里尔克《豹》中豹的生命强力。豹与红彼得同样在逼仄而漫长的囚禁中感到“疲倦”“意志昏眩”、愿望“在心中化为乌有”“千条铁栏后便没有宇宙”,技术暴力的强制剥夺自由、摧毁自主意识,造成它们精力衰竭、内心绝望与对世界的虚无感。强悍的豹被暴力工具化,生命贬值为死寂的标本,而软弱的红彼得在暴力面前近似于边沁“全景敞视监狱”<sup>[7]188-189</sup>中的罪犯,它无力抵御他者目光无时不在的多方窥视,身心疲惫、焦虑不堪却又无处躲藏,最终导致精神防线的全面崩溃。它甚至丧失了豹保持沉默与尊严的权利,而必须迎合、赞美权力的侵犯。

在权力运作中,机械硬暴力是短暂的,文化软暴力是漫长的,但期间的过渡非常关键。小说中对红彼得的囚禁压制只用了几个月时间,但通过文化习得方式的自我驯化却用了5年。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意味深长:囚禁红彼得的笼子并非完全是铁制的,而是有一侧以木板制成。这是狡诈的权力在施暴中设下的温水煮青蛙式的圈套——逐渐斩断猿猴与自然母亲之间的脐带关系、归属关系。在大自然中,树木是猿猴的栖身之所,相当于自然母亲的胎盘或怀抱;囚笼中的木板是权力的诡计,蓄意在红彼得的孤独与痛苦中唤起对生命的依恋心理,软化反抗意志,它暗示这里尚有熟悉的温暖气息与微茫的希望,这些虚假慰藉诱导妥协退却、劝说屈服顺从,其真实目的不过是害怕猎物会因陡然而至的异化环境而刚烈决绝地以死相拼。小说中“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当时出奇地安静,因而得出结论,我若是不立刻死掉,只要能安然度过第一段危险期就可以驯养”<sup>[1]364</sup>,这恰恰证明了笔者的猜测。

初期驯化过后硬暴力的施加开始减弱,但权



力的渗透、诱骗与控制却在逐渐加强。在中期驯化过程中，权力开始施展其狡猾的伎俩——软硬兼施，它既让受困者直面牢不可破的铁栏杆，感受到彻骨的绝望与恐怖，又通过安慰、围观、呼名、碰触等侵扰行动来与之建立最初的暧昧的联系。这些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行动完全都是权力早有预谋的攻势，它温柔地逼迫猎物就范，令其心甘情愿地向后退缩、退化直至完全屈服。最后，从权力进攻的预谋性与连贯性来看，笔者断定：铁笼一侧的那块木板其实就是权力预先设置的一扇通向教室的“门”，装有木板的铁笼是由钢枪屠戮到文化奴役的重要过渡阶段，武力惩之、文而化之，接下来的文化任务便由“那块木板背后”的教室和教师来完成了。

## （二）文化软暴力：船舱、教室、会场与办公室

软暴力，即权力通过文化教育、价值灌输等方式，在伤残、颓废的生命中植入奴性文化意识，以实现对其超时空的远程操控。小说中的船舱、教室、会场与办公室等空间是笼子的引申形式，是权力对红彼得实施软暴力的场所；酒瓶、教鞭、荣誉、成功都是钢枪的隐喻形式，是阉割其自由精神的武器。尼采认为暴力“惩罚消耗精力，引起可悲的衰竭和自卑”<sup>[8]60</sup>，而这正是权力要达成的暗恐效果，颓废的生命状态恰好为权力植入奴役文化提供了乘虚而入的好时机。此外，文化暴力运作的关键在于受虐者积极认同施虐者的价值并主动配合其施暴行为。红彼得通过受教育以短短的5年时间走过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进程，究其实质就是一个被劝诱、被灌输的文化施暴过程，是一个自由生命衰竭的过程。红彼得所受的“非我”的异化教育也是当下某些孩子正在经历的，这种“教育的结果常常是扼杀自发性……是除掉各种敌对反应。从恐吓和惩罚，把儿童吓怕，到巧妙地哄骗”<sup>[9]161</sup>，期间充满了福柯所说的规训与惩罚。红彼得沾沾自喜地走出狭窄的铁笼，却钻进了更残酷的、如“紧箍咒”般钳制其精神的文化囚笼，最后，它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笼中忍受着精神荒凉、心灵分裂的痛苦。该小说中非常清晰地表现了这个文化施暴过程。

### 1. 权力通过与受害者强行建立联系而将其

行为方式渗透到个体中去。船员们以多对一的围攻方式，用围观、呼应、骚扰、碰触等纠缠粘附手段强行与红彼得建立暧昧的情感联系。红彼得记得，“如果他们不上班，有时会来几个，围成半圆坐在我面前……只要我一动弹，他们就高兴地拍打膝盖。不时有人拿小木棒给我搔痒”<sup>[1]365</sup>。船员们这么多双眼睛对红彼得走马灯似的围观，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百眼怪兽阿尔戈斯监视伊娥一般不停地注视、窥探，这就造成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老大哥在看着你”的高压态势。他人品评的目光是一种压迫力量，如炼狱之火般残酷，就像轮番的刑讯逼供一样，往往让脆弱的人崩溃与屈服。身体伤残、心灵孤独的红彼得无力承受“被看”的巨大心理压力，权力就这样用高温高压手段制造出打开坚果的第一道裂痕。船员们又乘势追击，进一步关切并热烈回应红彼得细微的反应，甚至动手触摸、逗弄、讨好它。他们的这些暧昧的亲密方式都是蓄谋与其建立最初的联系。压力之下“人产生逃避自由的强烈冲动，或臣服，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借此摆脱不安全感，哪怕以个人自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sup>[9]23</sup>。这种情况下船员的敌人身份便模糊不清，甚至成了朋友关系。

2. 权力对受虐者的无意识劝诱。船员们在笼子前面的一切行为举止其实都是一种有目的、有程序的表演，或者说是一场专为红彼得而设计的“广告秀”，属于无意识劝诱。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论及广告效应：“广告的战略目标完全不是人的自觉意识，而是无意识劝诱。”<sup>[10]15</sup>“商品通过光芒四射的橱窗展示对人的深层欲望的引导和支配”<sup>[10]4</sup>。拉康也曾指出，“人的欲望总是他者欲望的欲望”，这可能是人和动物的普遍弱点。所以，船员们对红彼得的演示——吐痰、抽烟、喝酒、说“哈喽”，就相当于广告，具有诱惑、诱导、暗示其模仿等教化的作用。这便是文化渗透的方式，只要它在看、在听、在感受、有意识活动，权力就可以对其潜意识进行殖民化——植入木马。红彼得说：“我对人光凭记忆辨别不清楚。但其中有一个不断地上我这儿来……不分白天黑夜，他手拿酒瓶走到我跟前，开始给我上课……而我竭力模仿。……而他一边抚摸着肚子一边笑着结束了他的理论课。”<sup>[1]366</sup>鲍德

里亚说:“他者欲望是每一个人深层动机中的欲望,而广告的秘密则是对这种欲望的深层情境加以控制。”<sup>[10]13</sup>红彼得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权力操控了,它说:“我没有打算,但静静地坐着观察。我看着这些人……在我眼中常常就像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或者说这些人走来走去是不受阻挠的。一个崇高的愿望朦朦胧胧地在我心中升起。没有人向我许诺过,如果我变得和他们一样,则笼子上的铁栅栏便可以拆掉……是大量观察的积累才把我逼向了这个特定的方向的。”<sup>[1]366</sup>广告往往会制造出某种主体的幻觉,将观看者带入到演示的情境中去。广告的潜台词往往是:“……你值得拥有”,或者“只要你拥有了……,就可以像……一样。”“广告的本质就是象征和幻象功能”<sup>[10]14</sup>,红彼得正好借此功能一厢情愿地建构其虚幻自欺的愿景——与人类平等共存的“想象的共同体”。

3. 权力假教师的身份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实施系统的驯化教育。红彼得在幻想成为人的自欺中,开始厌弃自身的原始本性,认同人类的行为方式。它虽然备受虐待,却采取理解、赞赏施虐者的立场,“我如此反复上了无数次课……他把燃着的烟斗凑近我自己够不着的某处皮毛……我们俩是站在同一边与我的猿性作斗争”<sup>[1]367</sup>。这符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权力通过意识形态教化在受害者身上制造认同与共谋,“被强制者会选择强制者所希望的行为”<sup>[5]190</sup>。红彼得的遭际隐喻了通往奴役之路的现代人的困境,现代社会中“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一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是不够的。关键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虽然必须替人们选择好信仰并强加在他们身上,但这些信仰必须要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成为一套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sup>[2]169</sup>。红彼得在权力的隐蔽进攻下接受被强加教授的价值信条,以主人的“高尚”愿望置换自己的“卑劣”猿性。在进入权力为它设定的轨道后,它还自发地强化这种自虐式的学习,以加速自我异化,“我继续在学啊……自己成了监督自己的鞭子,最微弱的抵抗都会招致皮开肉绽。猿的天性咆哮着、飞滚着离我而去”<sup>[1]367</sup>,

红彼得虽然积极学习人类价值规范并努力践行,但是它并没有争到高于奴隶的价格。因为“虽然被强制者时时刻刻一直还在为他自己作最大的努力,然而他的行动正在适应的唯一周密计划,却是他人的计划”<sup>[5]191</sup>。这像极了今天的某些补习教育。

4. 编制与“成功”——权力为奴隶设置的愿景诱惑。对于红彼得“宇宙的尽头是进编制”(也即K的城堡),它的各种“成功”其实都是权力的赐予,或者说是权力设置的致命诱惑,使其迷醉在《美丽新世界》《楚门的世界》里。它拥有办公室,获得参加集会、作演讲以及向科学院汇报的资格,都是权力等级制度赏赐给它的一个跪拜的位置,这位置、品级也标志着它戕害自我、效忠他者的异化程度。红彼得由阶下囚到被纳入到社会奴役体系当中,谋求到一个坐稳了奴隶的位置——高级应召演员或者某种专家,这背后都是权力操弄的结果,“这些权势集团声望如此之大,以至于低层阶级急于接受并模仿他们的价值观,并在心理上向他们看齐”<sup>[9]75</sup>。

### 三、权力规训的效果:从接受虐待到自我驯化

权力对个体实现全权操控的最后阶段,是通过物质诱惑、荣誉奖励、价值目标设定等手段来鼓励奴隶圣化受虐、自我驯化、认知定型、观念固化,以实现对其终生操控的效果。红彼得自以为走上了人类高级进化形态的历史进步阶梯,其实不过是在权力操弄下偏执地削足适履、狂热地自我异化;它所谓“人生”成功的巅峰,不过是叔本华所说的“辉煌的欲望的囚徒”,它因被灌输错误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海市蜃楼般的虚假幻相,形同现代社会中被传销洗脑的妄想症患者。

1. 权力压榨的关键是唤起奴隶的配合与共谋。用尼采的话说就是牧师令其教众在精神上罹患颓废的疾病,以实现他对教众的看护、服务与操控;用现代心理学术语即令受害者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红彼得的进步与成功其实就是经历从身体受虐到精神自虐的过程。红彼得很快就聪明地领悟到了权力的暴虐诉求,于是受虐成为它与他者世界建立联系的畸形方式,而自虐则成为

它悦主求荣的渔利方法。红彼得受到烟斗烫烧皮毛的虐待时，不但完全接受这种虐待，而且还从其中啜吮、升华、神圣化出虐待的进步价值。鲁迅先生说：“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红彼得厌弃自己的本性而与施虐者保持一致，还煽情地说：“我们俩是站在同一边与我的猿性作斗争。”<sup>[1]367</sup>红彼得精明地发现，忍耐肉体摧残的痛苦可以换得某种接纳与认可的补偿。尼采指出，“痛苦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补偿损失？只要制造痛苦能够最大限度地产生快感……驯服的家畜极力表现其谨慎，甚至伪善……残酷在被不断地升华和‘神化’”<sup>[8]46</sup>。红彼得配合受虐的举动被权力认定为“进步”并不断获得奖励，这培育了红彼得扭曲的价值观，它甚至视敌为友，向科学院的主子们告白：“我能有今天……该感谢这船上的人们。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些好人……使我首先放弃了逃跑的念头。”<sup>[1]365</sup>红彼得的表现是典型的“斯得哥尔摩综合征”。弗洛姆认为：“受虐冲动的目的在于把自己完全消解在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借此分享它的力量与荣耀。施虐和受虐倾向的原因都在于个人无法忍受孤立，需要借共生关系克服这种孤独。”<sup>[9]146</sup>红彼得为了摆脱暴力侵害带来的孤独与恐惧，希望通过麻痹自我、放弃责任来与施虐者融为一体，达到精神死寂的无我状态，这注定是一条从“精神胜利法”走到生命彻底颓废的毁灭之路。

2. 权力通过恩赐和奖赏的狡计，诱使红彼得把取悦权力、谋求被接纳与收编作为奋斗目标。权力植入的奴性价值观念成为红彼得自我异化的强劲动力，它在报告中说：“当公众对我的进步表现出兴趣，我的前途变得辉煌起来的时候，我就自己聘请老师，把他们安排在五个彼此相连的房间里，我不停地从这间跑到那间，同时听他们上课……我达到了欧洲人具有的普通教育水平。”<sup>[1]368</sup>红彼得作为现代高强度“课后补习班”的始作俑者，它以他人的兴趣、喜好为努力的方向，为讨好权力他者而展开积极的自我驯化，甚至残酷地压榨自我，如其所言，“自己成为监督自己的鞭子，最微弱的抵抗都会招致皮开肉绽”<sup>[1]367</sup>。可是它不管怎样疯狂地自我异化，常识告诉我们，“世间事物都不会离开他们的自

然本性而仍安定或长存下去”<sup>[11]102</sup>。康德也指出，“从扭曲的人性之材中，造不出什么直的东西”<sup>[12]243</sup>。红彼得激进的自我驯化造成它深度的精神分裂，它既无法融入人类社会，却又因蔑视自己的族群本性而失去归属感，“深夜我若是从宴会、学术团体或是舒适的聚会回到家里，总有一只半驯化的小母猩猩在等候我，我以猿的方式在她身边享受天伦之乐。白天……我不敢看她”<sup>[1]368</sup>。红彼得白天却不敢面对小母猩猩，是因为小母猩猩击碎了它自欺欺人的“白日梦”——与人类平等共处的“想象的共同体”。

3. 红彼得所谓的“成功”不过是权力为奴隶设置的“太虚幻境”，是它自虐之后的麻醉剂，是主人更高妙的奴役方式而已。红彼得的满足感、自豪感只是它自我逃避、自我欺骗的“精神胜利法”，因为它衡量“成功”的标准完全来自主人的价值体系和话语认定。哈耶克说：“当一个人受到总是吩咐给他去做的事情约束时，那么，这就是绝对的奴役。”<sup>[5]189</sup>红彼得得意地说：“晚上几乎都是演出，我的成功可以说已接近巅峰”<sup>[1]368</sup>，可“演出”二字暴露了它献媚主人、取悦权力的戏子身份，演出不过是它遗忘真实自我、自欺地融入人类社会的方式。弗洛姆说：“为了克服孤独与无能为力感，个人便产生了放弃个性的冲动，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里。”<sup>[9]147</sup>红彼得炫耀的进步与成功只不过是奴隶的攀比心态作祟而已，希望以进步的幌子掩盖自己身份焦虑的恐惧和精神分裂的痛苦。

## 四、结 语

《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真正的主角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权力，报告是科学院这座官僚权力城堡各部门联合施暴后生成的各项技术效果清单。红彼得是权力规训的产物：它的身体、本性是猿猴，而名字、观念却来自人类。它在器械暴力的打击下，从一只自由的猿猴变成笼中困兽，又在文化暴力的诱惑与教训下，变成人类社会中的奴才红彼得。权力塑造了它“自由-受虐-自虐”的生存轨迹，使它成为半兽人。红彼得并非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正在走向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而是踏上了苟延残喘的奴役之路，其



颓废的生命表现出逃避自由、身份焦虑、谋求“成功”、陷于平庸之恶等特征。红彼得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末人非常契合,权力驯化末人,末人膜拜权力,个体生命的普遍颓废与退却会配合官僚制度创造出权力需要的施暴环境<sup>[13]</sup>。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犹太人通向奥斯维辛的命运,甚至预示了现代性与大屠杀间的关系。弗洛姆曾深刻地指出:“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能秉持怀疑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sup>[14]66</sup>

### [参考文献]

- [1] 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精选 [M]. 叶廷芳, 张荣昌,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7.
- [2]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M]. 王明毅, 冯兴元,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3] 尼采. 尼采文集·权力意志卷 [M]. 张念东, 凌素心, 译.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4] 汉娜·阿伦特. 共和的危机 [M]. 郑辟瑞,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5] 哈耶克. 自由宪章 [M]. 杨玉生, 冯兴元, 陈茅,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6] 戴春雷. 从“敲榨”到“敲碎”: 由“敲门”细节透视卡夫卡《变形记》“吃人”主题 [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 113 - 120.
- [7]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 [8] 尼采. 论道德的谱系 [M]. 周红,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 [9] 艾里希·弗洛姆. 逃避自由 [M]. 刘林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 [10]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 [M]. 刘成富, 全志钢,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11] 维柯. 新科学 [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12] 以赛亚·伯林. 自由论 [M]. 胡传胜,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0.
- [13] 戴春雷. 囚笼中的末人: 论《致某一生》中通往奴役之路的红彼得 [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70 - 80.
- [14] 艾里希·弗洛姆. 论不服从 [M]. 叶安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 From Cage Imprisonment to Cultural Implantation: On the Discipline of Power in *A Report to an Academy*

DAI Chunl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Abstract:** Behind Franz Kafka's *A Report to an Academy*, a masochist's report on his experiences with a sadist, lies a castle of power made up of technocrats who abuse in the name of science. Red Peter, the ape-like presenter of the human name, is only the result of the production of power, the invisible protagonist of the novel. The Academy, the highest bureaucratic authority, used violence at all levels to discipline and manipulate Red Peter, forcing him into submission and luring him into slavery. Its essence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sochism to self-masochism under the guise of power. The power discipline of the bureaucracy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hard force of mechanical blows and the soft force of culture. The discipline results in Red Peter suffering from Stockholm syndrome, adapting to and worshiping power, and self-domesticating.

**Key words:** power discipline; violent operation; self domestication

(责任编辑 陈蒙腰)